



乱都之恋

张我军作



清华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代 娇



乱 都 之 恋

张我军 作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零印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75 字数: 45千 插页: 3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

统一书号: 10429·065

ISBN 7-5610-0062-6/I·26



《乱都之恋》时期的张我军和夫人罗心乡



出版说明

为适应高等学校关于台湾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需要，本社将出版《现代台湾文学史》及其配套的参考资料丛书。这套资料丛书，由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及武治纯（特邀）等先生所主持的《现代台湾文学史》编委会承编。

《乱都之恋》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张我军先生的新诗集。1923年，生长在台湾的青年张我军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与同学罗心乡女士相爱，但为女方长辈所梗并迫罗女士另嫁他人。在关键时刻，两人奋力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双双远去台湾成婚。《乱都之恋》就是他们当时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斗争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1925年12月于台北出版发行，但已散失绝版多年。今天，为了纪念这位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先驱者——张我军先生逝

世三十一周年和他的新诗集问世六十周年，由张我军先生的长子张光正先生将这部失而复得的《乱都之恋》提供我社作为“现代台湾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第一本重印出版，弥补了台湾新文学史研究工作中一部重要作品的欠缺，排除了多年来海峡两岸四处寻觅这部诗集者心头的遗憾。

本书除原书中的五十五首新诗外，另将张先生的《弱者的悲鸣》和《孙中山先生吊词》两首新诗作为附录编入。这五十七首诗是目前发现的张先生的全部新诗。1925年张先生发表的《诗体的解放》，是他在新文学运动时期的一篇重要的诗歌理论文章，对研究、理解他的诗作颇有价值，也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供读者参考。

张我军先生的夫人罗心乡女士的《忆乱都之恋》，原系最近由美国寄来的家书中的一段自叙，从未公开发表过，这是了解和研究张我军先生诗集极为难得的资料，现特刊于本书，以飨读者。

此辑全部诗文及罗女士的文章，均经张光正先生校阅，他对原版中明显错漏的文字和标点做过修正，并在书中作了简要注释。在此谨表谢意。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年11月28日

张我军先生在现代台湾文学 史上的不朽功绩

——《乱都之恋》重版代序

武治纯

《乱都之恋》是现代台湾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犹如祖国大陆五四文学中的《尝试集》。这一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珍贵文献，在绝版六十年以后失而复得，今天能够同广大读者见面，是新时期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的喜事。

张我军先生原名张清荣，1902年出生于台北板桥，1921年前来祖国大陆，先后在厦门、北京半工半读，继曾在北京几所大学任教多年。他的生平有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经常奔波于台北和北京之间，抗战胜利后返回故乡，1955年病逝于台北。他的一生经历了海峡两岸的悲欢离合，融汇了热爱台湾乡土和热爱祖国大陆的深厚感情。

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张我军先生成

长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旗手。他在现代台湾文学史上，一向与“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齐名，立下了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三大功绩：

第一，拆毁封建旧文学殿堂，撒播五四新文学火种。

五四运动后在台湾展开的新旧文学论战，是由张我军先生打响的第一枪。他于1924年4月21日在《台湾民报》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此后他又接连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揭开闷葫芦》、《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著名文章，发起了对台湾旧文学的猛烈批判，并且把祖国大陆的五四文学主张，以及鲁迅、郭沫若、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陆续介绍到台湾，一往无前地为台湾新文学拓荒、播种、催生。

第二，立下台湾新文学座标，明确为台湾新文学定位。

在台湾新文学的开拓期，台湾虽然处于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地位，但是张我军先生仍然以爱国作家大无畏的精神宣称：“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血缘关系。最近，台湾文坛著名评论家

叶石涛先生在他的一篇重要文章《走过纷争岁月，迈向多元年代——台湾文学的回顾与前瞻》（载1985年10月29日《自立晚报》）中，高度赞扬张我军先生“坚强地主张，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环节”，“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海峡两岸文坛一致公认，张我军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这一文学观点具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在思想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指出了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语言方向。

在台湾白话文运动中，张我军是最有力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主张“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把有音无字的台湾方言改进为话文一致的文学语言，从而使台湾文学“不与中国文化分断”，表现了青年时期的张我军已经是有多么久远的和广阔的历史眼光。他的第一部新诗集《乱都之恋》和一系列散文、小说及评论作品，完全采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普通话写作，文学语言清新、活泼、明畅、通俗，适应了台湾文学语言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有利于全国各地人民阅读，有利于反映出他的创作主导思想中的革新意识和现代意识。历史已经证明，张我军的主张代表了台湾新文学语言建设的正确方向。

在此，热烈祝贺现代台湾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乱都之恋》失而复得；热烈祝贺由《现代台湾文学史》编委会承编、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台湾文学史教学参考丛书第一部——《乱都之恋》同广大读者见面。

1986年11月 于北京

目 录

序.....	(1)
沉寂.....	(3)
对月狂歌.....	(4)
无情的雨 (十首)	(5)
游中央公园杂诗 (六首)	(11)
烦闷 (四首)	(14)
秋风又起了 (六首)	(17)
前途.....	(20)
我愿 (三首)	(22)
危难的前途.....	(24)
乱都之恋 (十五首)	(25)
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 (六首)	(33)
春意.....	(36)
附录〔一〕	
弱者的悲鸣.....张我军	(37)
孙中山先生吊词.....张我军	(38)
诗体的解放.....张我军	(43)

附录〔二〕

忆乱都之恋……………罗心乡（56）

喜迎《乱都之恋》归来……张光正（59）

附录〔三〕

张我军先生传略……………本社资料室（62）

乡国之情 血泪之华

——写在《乱都之恋》重版前夕

……………张仲景（65）

台湾新文学的鼓吹者

——张我军及其诗集《乱都之恋》

……………〔台湾〕黄天横（75）

序^①

人生无聊极了！苦闷极了！
仅仅能够解脱这无聊，安慰这苦闷的，
只有热烈的恋爱罢了！
实在，没有恋爱的人生，
是何等地无聊而苦闷呀！
然而，恋爱既不是游戏，也不是娱乐呵，
真挚的恋爱是要以泪和血为代价的。
我曾经过了热烈的恋爱生活，
且为了这倾了无数的血和泪。

① 这首序诗曾发表于1925年12月17日《台湾民报》第85号。《台湾民报》的说明如下：“《乱都之恋》一册系张我军君的第一诗集，张君这一年来的作诗尽收在这里，有的发表于北京晨报，有的在民报发表，也有未曾发表的，这次受了朋友之劝，已决定印成书想在新历年底可发行。”

这小小的本子里的断章，
就是我的血和泪所留下的痕迹。
我欲把我的神圣的泪痕和血迹，
献给满天下有热烈的人间性的
青年男女们！

1925年12月14日

沉 寂^①

在这十丈风尘的京华，
当这大好的春光里，
一个T岛^②的青年，
在恋他的故乡，
在想他的爱人。
他的故乡在千里之外，
他常在更深夜静之后，
对着月亮儿兴叹！
他的爱人又不知道在哪里，
他常在寂寞无聊之时，
咀咒那司爱的神！

1924年3月25日在北京

① 本篇曾发表于1924年5月11日《台湾民报》第2卷第8号。

② T岛指台湾岛。

对月狂歌^①

这样黑暗的世界，
在这沉寂寂的夜里，
殷勤地展开着你慈爱的眼睛，
熟视破窗里的穷人；
我感谢你！我赞美你！
呵呵！月里的美人哟，
你是我仅有的知己！
你是我永远的伴侣！

1924年3月26日在北京

① 本篇曾发表于1924年5月11日《台湾民报》第2卷第8号。

无情的雨^①

(十首)

—

天是还未明的，
我的睡魔已经跑去了。
哦哦！夜来监视着，
不愿它继续落下去的雨，
困了几小时的贪眠，
声势愈发猖狂了！

① 本篇曾发表于1924年7月21日《台湾民报》2卷13号。发表时在诗后注明：“附：这十首诗送与回到故乡去了的甘振南君看。”

二

听一滴滴掷在屋瓦上的雨声，
如一根根的针在刺我的心房。

天呀！你忘了么？——

今夜的月底下，
是我们要造我们的
甜蜜的历史的一段呀！

三

唉！唉！唉！这时候，
怕伊也被那如针刺的雨声
叫醒过来了。

雨呀！快点儿歇息吧！
莫要把伊的柔肠刺断呀！

四

雨是已歇了，
太阳似乎怕什么，
羞涩涩地不敢露面。
云缝里，
偶尔射出来的一片微光，
强调了我无限的希望！

五

可是懒洋洋的云，
老是不肯飞散。
哦！原来不是不飞散呵！
四面望到天尽处，
倒是没有容它的空地。

六

黑的云，灰色的云，
纠做一团团，
只在这近处乱滚。
我不安的心儿也跟着
在局促的心房里，
滚来！滚去！

七

一会儿，昏濛的世界，
又下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雨。
街道上，
剩下几个没了半身在水中，
拉着车儿走着的人力车夫之外，
已没有行人之影了。

八

傍晚时候，
不耐烦的雨又歇了，
约束的时间也早到了。
可是这样满街道的泥泞水窟，
怎得伊出门？

九

哦！哦！屋角上的白云，
扶拥着初罢晚妆的月姐，
姗姗地步出雨后的天街了。
忙忙在赶路的月姐呀！
你是不是会你的爱人去？

十

本来是该和伊共赏的今夜的明月，
却为了这早晚的无情的雨，
强教人各在一方。
望着光艳艳的月光、夜色，
思量着甜蜜的梦，
过这无聊的一夜！

1924年6月12日，在北京

游中央公园杂诗^①

(六首)

一

小山上，
绿草又长了几许了。
不错呀！
相别已两度月圆呵！

二

草儿烦闷着，

① 本篇曾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台湾民报》3卷6号。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

似乎在问我：
前回那位少女，
别来好么？

三

月姐冷笑着，
似乎在问我：
前回那位少女，
没有伴你来吗？

四

虫蛙们围绕着我，
热心地奏起他们的夜曲，
似乎在催我：
重理旧日的梦。

五

——小草儿偷听了我们的细语，
月姐照澈了我们的心田，
虫蛙们为我俩奏了和谐的曲，
我俩陶醉在自然与爱的怀中，
相对着微微地笑！

六

草儿，
月亮，
虫蛙们，
在微凉的晚风中，
互相礼赞了。
我怅怅地说：
“再见！”

1924年8月8日，在北京

烦 闷^①

(四首)

一

每到黄昏时，
我的心儿便狂跳、凄酸。
心儿狂跳，心儿凄酸，
都是因了屋后的那株老树，
满脸浴在斜阳里，
现出忧愁抑郁的金黄色；
无气力地，悄悄地，
漏出人生寂寞的消息！

① 本篇曾发表于1925年3月1日《台湾民报》3卷
7号

二

我站在老树的背后，
沉思复叹息！
默默地，
偷听了它带来的消息：
它说我故乡的风景如旧，
只多着一个年老的母亲，
日日在思儿心切！
一会儿太阳沉下去了。
他也把忧愁抑郁的脸收起，
我也无从再探消息。

三

每到月明时，
我的心儿便狂跳，凄酸。
心儿狂跳，心儿凄酸，

都是因了那在屋角探首的月姐，
现出伊那怪无聊而冷淡的脸色，
无气力地，悄悄地，
漏出人生寂寞的消息！

四

我坐在纸窗下斜仰着首，
沉思复叹息！
默默地，
偷听了伊带来的消息：
伊说我的爱人依旧
依旧被牢圈牢住，
故不能和我常谈蜜语。
一会儿乌云密布，
月姐也收起伊怪无聊而冷淡的脸色，
我也无从再探消息！

1924年9月，在北京

秋风又起了

(六首)

一

秋风又起了，
故乡的慈母呵！
不知道您老人家，
怎样地紧念着
海外的孤儿！

二

给母亲的信，
都说儿子身上好。

但是呵，其实这身儿，
是向着憔悴，消瘦！

三

去年的初冬，
在阴沉沉的鹭江^①江上，
一只船送了母亲
回到故乡去；
一只船载着我，
向了流浪的旅程。

四

母亲呀！故乡的母亲！
其实儿不该送您回去，
而独自飞奔到天外。

① 指厦门与鼓浪屿之间的水面。

五

如今呢？
身儿病，
心儿也病。
昔日的愿望，
又一无所成。
唉！何处是我的前程？

六

夜已深了。
窗外虫儿声甚哀，
二年前奔丧的光景，
历历现出眼前来：——
银灰色的朦胧的月光，
映照着了父亲的墓碑。

1924年9月，在北京病中作

前 途

半夜破了梦醒来，
伸一伸手摸索了没有伊在。
环顾是黑漆漆的，
屋外可怕的夜的声，
是将落的树叶儿挺在秋风里，
作最后的悲壮的雄呼。
我的心儿忽而一阵阵地酸痛，
咀里念着伊可爱的名字，
脑中浮出伊怪可怜形容，
胸儿紧紧地靠着被儿作抱拥。
莫名其妙的热泪从眼窝角，
一滴滴地直滚下来。
唉！茫茫的宇宙，
短促的人生，

青春将去了，

前途！前途！

可怕的、可诅咒的前途！

1924年中秋前一日在北京

我 愿

(三首)

一

我愿做个碗儿，
日日三次给伊密吻，
吻后还留下伊的口味。

二

我愿做个镜子，
置在伊的房里，
大清早伊起来，
便和我相视而微笑。

三

我愿做个牧童，——

倘伊是个浣衣女。

暮暮朝朝

我牧着牛而伊捣着衣，

在水流淙淙的小河畔，

从容地、自在地，

和伊交谈蜜语。

1924年10月，在北京

危难的前途

一梦醒来，
枕布和袖口怪湿着。
确是刚流的热泪哪！
但是这却为了什么？
我仔细重寻梦路：
分明是伊凄惨地
告诉我伊的苦情，
所以引起我
想起我俩的前途，
想起我俩的危难的前途！

1924年10月4日，在北京

乱都之恋^①

（十五首）

（乱都是指北京，因为那时正值奉直开战，北京城
内外人心颇不安，故曰乱都。）

一

不愿和你分别，
终又难免这一别。
自生以来，不知经历了
多少的生离和死别，
但何曾有过这么依恋，
这么怜惜的离别！

① 这一组诗的前七首曾刊载于1925年12月31日出版的台湾《人人》杂志第二期。

二

乱哄哄的北京，
依旧给漫天的灰尘笼罩着。
我大清早就督着行李，
冲着杂沓的喧嚣
冒着迷濛的灰雾，
独向将载我走的车中去。

三

秋朝的天空，
半晴不晴地，
散射着很微弱的朝晖。
微光里，愁惨中，
火车载我向南去了。

四

火车纵无情，
火车纵万能，
也载不了我的灵魂儿回去，
我已尽把它寄托在这里了。

五

唉！昨日在先农坛的树荫下，
话别的一对少年男女，
今朝一个在家中叹息，
一个在辘辘地响着的车中含泪！

六

陶然亭惜别之处，
今朝牧童和樵女，

定必依旧在那里
交他们的蜜语。
然而昨午小冈上的
一对少年男女，
今朝何曾有个影儿？

七

火车渐行渐远了。
苍郁的北京也望不见了。
呵！北京我的爱人！
此去万里长途，
这途中的寂寞和辛苦，
叫我将向谁诉？

八

你知道吗？我的爱！

我把你的小影儿揣在怀中，
正如和你并坐而抱拥。
一站站车停时，
我都把你拿在掌中，
默默地向你诉说：
我的离情凄楚！

九

噯唷“再见，两年后”么？
况是万里长途呢！
我不愿归去了，
但又不得不归去呵！
我只得把我的灵魂儿，
交给伊管领在乱都。

十

秋柳！铁路旁的秋柳！

春去了你憔悴吗？

但是，你何须憔悴，

春不是也在恋你吗？

明年暖风吹时，

春又将跟他来了。

十一

旅店的孤灯暗淡。

窗外的明月凄惨。

呀！月又圆了，

人已散了。

我独坐孤灯下，

深深地叹息复叹息！

十二

长途的旅行，
是何等地辛苦！
身疲困而心凄怆的旅人，
连夜又提着行李，
奔向船上去了。

十三

海上的明月分外皎洁。
海水微微地波着，
凉风徐徐地吹着；
这样月白风清之夜，
爱人哟！几时才能叫我不感着
如今夜的孤独无聊！

十四

晚风微微地吹着，
好象是行人在叹息。
夕阳刚刚沉下去了。
西山上的天空，
染着半天的金黄色；
呵呀！万种怜恋之情，
尽漂浮在这黄昏的空中！

十五

威海卫的连山一直向后退了。
船底下渐渐地发出沙沙之声，
雄纠纠地向着茫茫的大海去。
去呀！去呀！
远了！远了！

1924年10月14日于黄海之上

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

(六首)

一

“……我欲紧紧地抱住伊，
好把恋爱的苦恼来脱除；
然若不能脱除这苦恼，
则情愿死在伊的胸上！……”
我独自在田畴徘徊之时，
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

二

我跑到小河上，

停立在一条木桥当中，
驰想万里重洋外的伊。
万千愁绪凑成一根尖锐的针，
一直把我的心儿刺！

三

唉！白云依依飞向天外去，
故乡的山从四面把我围住，
望眼连天，何处是伊——
我的爱人的居处！

四

往事尽是不堪回首，
将来更是不堪设想，
此刻呢？
更是万分难受！

五

我把尽有的热泪，
洒到小河里，
吩咐小河的流水，
把我的热泪送到伊的心湖去。

六

但是，小河的流水呀！
倘你能流入北方诸海，
也流不到伊的心湖吧！
然则，我的泪滴将打发谁送？
我今日的苦恼，
怎能得伊知道？

1924年11月11日，在台北板桥

春 意^①

温暖柔和的春日下，
春草青青，
春水盈盈，
柳条儿嫩绿地吐着微笑：
远方的人呀！
为何到此，
我的心潮便高涨？
哦！这就是春意吗？

1925年春日在台北板桥

① 本篇曾发表于1925年7月19日《台湾民报》61号，发表时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25年3月。

附录一

弱者的悲鸣

树枝上的黄莺儿呵，
唱吧！尽量地唱你们的曲！
趁那隆冬的严威，
还未冻你们的舌，壅塞你们的嘴。
唱呀！唱呀！唱破你们的声带，
吐尽你们的积愤。
青空中的白云呵！
飞吧！尽量地飞向你们的前程！
趁那恶热的毒气，
还未凝壅你们的去路。
飞呀！飞呀！无论东西、无论南北，
任意飞向你们的前程。

（原载《台湾民报》六十一号，1925年7月19日）

孙中山先生吊词^①

唉！

大星一坠，东亚的天地忽然暗淡无光了！

我们敬爱的大伟人呀！

你在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这

时刻已和我们永别了么？

四万万的国民此刻为了你的死日哭

丧了脸了。

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俱崩，

如失了魂魄一样，

西望中原禁不住泪落滔滔了。

先生！

你在西纪一八六六年，

带着你超群的天才，
满身的爱国家爱人类的精神，
革命思想和实行的毅力，
深入我人类之伍以来，
前后六十年了。

你年才入冠，便委身于救国运动和革命
事业，你在四十年的中间，

始终用了你的万挠不屈的毅力，
你的表示始终一贯的精神，
来实行你千移不易的主义。

那专制横蛮的满清朝廷的迫害，
那无恶不为的军阀的压迫，
那野心勃勃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嫉视，
终不能奈何先生！

你的精神，你的理想，
虽未十分实现，

但是，你的毅力意气，
已推翻满清，建造了民国，
吓坏了无耻的军阀，
和残酷的外国帝国主义，
唤醒了四万万沉睡着的人们了。

可是啊！
三民主义还未实现，
中国的革命还未成功，
大亚细亚联盟还未实现，
前途正乏导师之时，
你残忍刻薄的死神，
你竟把这位千古不获的导师，
夺到死的国度去了！唉！

中国的同胞哟！
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
遗训：

革命还未成功，
同志尚须努力哪！
先生的肉体虽和我们长别了，然而
先生的精神，
先生的主义，
是必永远留着在人类的心目中活现。
先生的事业，
是必永远留着在世界上烂烂！

1926年3月26日

① 这首吊词原载于台湾《传记文学》第六卷第三期黄季陆先生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吊词前之黄文如下：

“台湾同胞听到总理（按：指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无不暗暗地洒泪，但他们在日人的统治下，又不敢哭出声来。台湾的民众团体有志社筹备了一个追悼会，订于三月二十四日晚间七时在台北文化讲座举行，文化讲座的地点在今日台北市的贵德街，靠近第九、十号水门一带。是夜大雨倾盆，街道十分泥泞，到会无比踊跃，但会场只能容纳三千人，在开会半小时以前即告满座，迟到的人只得在场外敬礼默哀而去。大会从晚七时至深夜十时无一人中途退场者。台湾同胞举行的这一追悼会，真是得来匪易，因为当时日本人是反对台湾同胞追

悼总理的。在开会的前一天，就传有志社的干事到警察厅去讯问，命令他们把已经拟好的一份悼歌作废，不准在会场唱歌，又不准朗读吊词，亦不准演讲，控制刁难无所不用其极。而台湾同胞却仍在日人高压下，在暗夜的风雨中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壮烈的追悼会，是怎样的难能可贵啊！

这一份被日本警察禁读的吊词，是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崇敬总理的心声。吊词作者是在几年前去世的张我军先生，亦即是最近由美返国的本省学人在台大任教的张光直博士的尊人。这一吊词虽然被日本警察署禁读了，但它却很快地就传到祖国同胞的耳朵里，凡是读到这一吊词的人，莫不为台湾同胞爱祖国、爱自由、崇敬总理的至诚而感动。

诗体的解放

一 引言

今日台湾的报纸上杂志上所载的诗，每日何只十首二十首，但要找出一首差强人意的好诗真诗，实在不外乎“缘木求鱼”了！

二十世纪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台湾的诗人有一个能表现的吗？孤悬于苍海中的小小的美丽岛，那里头的数不尽的佳山美水，台湾的诗人有一个能把它发扬的吗？所谓时代精神，所谓地方色彩，我们绝不能从无数的台湾诗人找出。至于高洁的思想、优美的感情，更莫想要求之于台湾诗人的作品了。这是为什么缘故？诗会诗社林立着，诗翁诗伯遍地皆是，三尺的孩子也在闹做诗，一年到头差不多隔日开一次的击钵吟，真是“洋洋乎盈耳哉”！台湾的韵事到最近算是极一时之盛了！台湾诗人的训练也不算不足了。然而因为他们执迷着死守着已成的法则形式，奉先人偶定的形式法则为天经地义，实不知他人已定的形式只是自己的监狱。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驱

入监狱里头，故不能自由奔放，自由表现，而且久而久之，遂变做一种习惯牢不可破。故我们欲改革诗，非从诗体的解放入手不可。

二 诗体解放的沿革

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便可以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三百篇虽然也有几篇组织很好的诗和几篇很婉妙的长短句，但三百篇究竟还不会完全脱去“风谣体”（Ballad）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文学发生，这是一次解放。但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杀尾字，变成贯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变成词。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是决不能句句限定五字或七字。诗变为词，只是从整齐句法变为比较自然的参差句法。唐五代的小词虽然格调很严格，但已比五七言诗自然得多了，这是三次解放。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从根本上看来只是逐渐删除词体里所剩下的许多束缚自由的限制，又加上词体所缺少的一些东西如衬套数字之类。但是词曲无论如

何解放，终不能完全打破词调曲谱的限制。到近来的新体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体格，不拘平仄，不拘长短，不拘韵，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要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四次解放。这种解放似乎很激烈，但其实是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它，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而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它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

三 诗的本质

这样的诗体的解放并不是从天外飞来的思想，乃是从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不过从前的解放不是彻底的，而且没有有意的去鼓吹，而这次却是有意的、彻底的解放罢了。我们欲更进而说诗的本质，以明诗之所以当改革的理由。——但诗的本质非在这么短篇文里所能详说的，这里要极简单地说。

诗差不多就是文学的全部，文学的精髓是诗。诗也有广狭二义，我们这里要说的是狭义的诗。有人说诗是由着急迫的节奏的人生的表现；有人说诗是将感情最率直地、最单纯地、最直接地表现出来的；生田春月氏又说他的诗只是他的眼

泪，他的叹息，他的微笑，他的哄笑，他的欢呼。我想我自己的诗是苦闷的象征。书经舜典说“诗言志，歌咏言。”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朱熹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即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我们综括上面的话大约可以排一个诗的公式：

高潮的感情+醇直的表现=紧迫的节奏=诗
诗是以感情为性命的，感情差不多就是诗的全部。然而感情若只在心里高潮而没把它表现——醇直的表现——出来，还不成为诗。所以有了高潮的感情更醇直地把它表现出来，便自然而然的有紧迫的节奏，便是诗了。

诗实在是神妙无比的东西，所以难以详细把它分析。我虽这么说了但一定还有很多不足不完全的地方，但这是没有法子的，因为“写诗容易说诗难，”这是大家所异口同音的。

四 诗与节奏

现在要说一说与诗最有关联的，并且差不多是诗的全部的韵律（或节奏）。

我们可把韵律分为四种：平仄法、押韵法、音数律（以上三种是形式律）、内在律（内容律）。下面稍加说明。

1. 平仄法是根据抑扬长短的韵律。中国的旧诗——尤其是绝诗律诗全用此法。如：

春。风。昨。夜。到。榆。关。 故。国。烟。花。想。已。残。
少。妇。不。知。归。未。得。 朝。朝。应。上。望。夫。山。

西洋的旧诗也常用此法。如：

When the moon is on the wave and
the glow—worm in the grass...(Byron)

中国旧诗——尤其是绝律诗的平仄法很严，若照平仄法所定纯粹地做诗那就太难了，所以生出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例外法来。但虽有一三五不论的特别的恩典，却也非常之不自由，所以便有较乖巧的诗人如李白、苏东坡等人做了破格的诗。

2. 押韵法是反复低徊的韵律。大约可分为头韵、胸韵、脚韵三种。西洋的旧诗这押韵法是必不可缺的，中国的旧诗只有脚韵而已。但中国的绝律诗脚韵限得太不近道理了。绝律诗韵脚绝不能跳出诗韵合璧所限制的范围之外一步，如有出韵的，虽是好诗也因其出韵而贬斥之。

3. 音数律是一句限定几字几音，一首限定几句几字几音的。如律诗是八句一首，绝诗则四句一首。又七言的每句七字，五言的每句五字。日本的俳句是五七五的音数，短歌是五七五七七的音数。日本的诗的韵律只有这音数律，而且自古以来就很严格地遵守来，虽然也有极少极少的例外。及至明治时代新体诗发生，尚采用这五七调或七五调，但现在完全打破这种形式了。

中国的绝律诗中的音数律是绝不容有例外的。譬如七言绝诗是一首四句二十八字，绝不能只是二十七字或是二十九字。中国的旧诗还有四字一句的，也有六字一句的，前者散见于古代诗歌里头，后者是文人的游戏试作，但近代来已不流行了。

上面所说的三种韵律是形式韵律。

4. 内在律（内容律或心律）。形式的韵律是人为的、传统的、非个性的，但内容律是诗人的呼吸其物，是诗人的生命、血肉其物，而且是不能和诗的内容——思想感情分离的。

流水淙淙之声、滴泽的雨声、萧飒的风声、暗夜行人的履声、行舟款乃之声、以至脉搏、呼吸……。总之，宇宙间诸现象以至万般人事，没有不依韵律而动的，这些韵律就是内容律内在律。

韵律非是随便自外部附加的机械的东西。真正的韵律是音乐，是从内心响出来的音乐，即是所谓心弦。什么一种东西触着心弦而响弹出来的音色，就是节奏（或韵律）就是诗。重复说一句，内容律就是我们的情感的波动之表出于外的，这同时也是诗。韵律也有缓急，有时候如徐风轻吻着明镜似的海面，有时候如万马之骤驰，如狂风之打猛雨。恋爱败破之日，最爱的人死了之时，其情感最高潮，其韵律也最急紧，诗人若将这情感这韵律用语言文字表出外面来就是诗了。情感平徐的时候韵律也缓慢，其表出来的便成为散文。所以我们可以说诗与散文的分别是在韵律之急与缓。在韵律结束我还要叮咛一句是：如果要求好诗真诗，即不可不排除一切形式的束缚而使内在律能充分地表露出来。

五 旧诗的缺点

诗的本质、诗与韵律的关系，虽然很草率却也大体说完了，我想读者对于诗也已经有一种概念了。现在要根据上面的话来批评中国的旧诗——尤其是绝律诗。

自三百篇以降，离骚汉魏乐府诸诗篇，形式还没有备，也还没有什么束缚。至六朝为律诗绝诗之源，至有唐而律诗绝诗大成，形式既备，束

缚亦随之而备至。演至近世，一般文人愈趋于技巧之末，遂和诗的本质愈趋愈远了。章太炎先生讲古诗的流变有几句很可参考的话：

（1）诗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是发于真性情的，古诗全从真性情流出所以“民无得而称焉”。

（2）陶渊明描摹风景自然有风致，小谢的诗也是如此。那大谢和颜延之的诗稍有雕琢及生硬的毛病，便不能及了。

（3）随时习南北朝遗风，爱用典故，注目在一二句好处，杨素不染这种习气，所以能高出人上。

（4）元（缜）白（居易）诗说几句民情，随便下笔毫无拘牵，所以还能得人的同情。

（5）宋诗爱对仗，崇典故，杂考据，中病已深。所以愈趋愈下。

（6）自然的风度愈遗失诗的品格愈下，世后矫揉造作愈甚，所以不能望古人之项背。

（7）妇人天然美的不必借重于脂粉，惟其天然不美才借重脂粉，诗也是如此。

章太炎先生这几句话把旧诗的缺点说尽了。综括其意无非是“矫揉造作、不顾自然”八个字。

后世文人因好矫揉造作而趋于技巧之末，故愈重视形式。因重视形式好弄技巧，所以内容——思想感情多被埋没或抹削去。

我尝谓中国的旧诗（绝律诗）的形式整齐极了，束缚也无微不至了，如字数、句数、平仄、押韵、对仗……等等的限制。还有，历来的诗人大都不把土语方言入韵文，这也是一个大毛病。绝律诗的毛病实在举不胜举，我们在这里不必详细尽举，读者如能体会上面所说的话，再拿旧诗来比较一下便明白了。

六 中国之所谓新诗

这样，中国的旧诗有了无限的限制束缚，以致思想感情都被虐杀了。于是民国五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便对于旧诗坛下了总攻击令。可是一班新体诗的运动者还不能尽打破一切的形式束缚，因为他们没有彻底的觉悟。当初他们的主张是无限韵，无限字数句数，不限平仄，不妨用白话做诗——大概是这样。但他们却不能脱得干干净净。如胡适的——

月冷寒江静	心头百念消
欲眠君照我	无梦到明朝

这首诗完全是一首五言绝句。又如——

也想不相思	可免相思苦
-------	-------

几次细思量

情愿相思苦

当然胡适自己也承认他的新体诗脱不净旧诗的巢套。他们——胡适、康白情、沈尹默、周作人等一班人，虽主张不限韵而且实际也不限韵，但尾音也还喜欢用谐音；虽反对限平仄，但也不敢侮视抑扬的音节，这是过渡时代难免的现象，可是他们后来也渐变了。一班新诗人的趋势渐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走，那个方向便是“自然的音节”，便是我所说“内在律”。但他们过渡时代的诗人终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于是便被时势埋没了。反之，有一班青年学生以为新诗太容易做了，于是管三七二十一把些极无聊的话排成行子便要算是诗，这又不成话说。但却也有几个很有望的诗人做出些真诗好诗来。如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中

略）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
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这种诗才算得是纯然的新诗。反对新诗的人都说新诗没有韵律。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形式的韵律之外还有自然的韵律——内在律。反正内在律方才是真正的韵律呢；如郭君这首诗什么人敢说他没韵律？有人问我中国的所谓新诗怎样？我便立刻叫他去读一读郭沫若君的诗。这样说并不是郭君的诗特别好到怎地，是因为他的诗才是现代的诗，和世界各国的新诗合致啦。

七 自由诗的发生

我在上节说郭君的诗和世界各国的诗合致，那是郭君的诗是自由诗派的诗。但是自由诗是什么？自由诗的运动在西洋诸国十九世纪后半期就发生了，在日本还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在中国是仅仅七、八年来的事。

自由诗是从法语*verse libres*译出来的。象征派的诸诗人于诗的形式上行了一大革命，他们不愿受他人所制定的规则来限制，他们不愿为古典的苦难的诗的法则所束缚，他们为表现他们的

禁不住心灵的呼吁。所以对古典诗，对于一切束缚自由诗形竖起反旗，站在一种极自由的新的形式之下，努力求获一种合于个性的诗形。

他们的诗的韵律和从来的外面的韵律法不一样，是内面韵的律即内容律。他们作诗是依靠从自己的心脏的呼吸生出来的韵律，内部的节奏，所以也有二、三字一行的，也有十数字一行的。

自由诗的运动虽是首举义旗于法国，但并不是法国的特产，英、美、德、俄各国都有参战的勇士。这是在表明各国人已共同趋向于同一的目标，一致欲脱离无理的束缚，而欲翱翔于自由的、适合个性的天地的。最近又有一派 theimagist（写象派）出而打破自来的诗形，欲做与散文差不多的诗。他们的主张此刻没有介绍的余裕，不过他们也无非是欲期自由诗的完成而起的。

八 结论

世界的诗坛已是这样的了，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诗坛能与世界的诗坛取一致的行为，如果想使我们的诗坛也开放几朵灿烂的鲜花，那末请大家把旧诗体来解放吧！我们应和自由诗派取同一的行路！

本文参考书

1. 文学概论 横山有策著

-
2. 新诗作法 生田春月著
 3. 胡适文存 胡适著
 4. 国学概论 章太炎讲
 5. 现代艺术讲 川路柳虹著
 6. A Study of Poetry, Bliss Penny著

(原载《台湾民报》三卷七、八、九号，
1925年3月1日—1925年3月21日)

附录〔二〕

忆乱都之恋

罗心乡

我十岁丧父，同寡母幼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幼时就读于北京第一女子小学，后跳级升入尚义女子师范学校。我发奋读书，一心想在毕业后当一名教员以供养母弟。十七岁那年，为了尽快提高学业，利用课余到北京师范大学夜间部补习功课。

一天我开箱找衣服，突然从箱子上掉下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信上只写了一首白话诗：

“……一个丁岛的青年……在想他的爱人！他的故乡在千里之外，……他的爱人又不知道在那里……”

看到这封莫明其妙的信，心中纳闷，就拿去给魏姐姐看。魏姐姐说这个青年很不错，还会作新诗，我替你查看查看。过些日子魏姐姐告诉我，这位青年就在你们补习班里，可是我们夜间部人很多，并不曾留意到这个人。有一天这个青年主动来找我攀谈，才知道他叫张我军，他说自

已不是来这里补习功课，而是来学北京话的。就这样，我们彼此相识了。我在魏姐姐陪伴下，每星期到他住的泉郡会馆去一次，说些话，借几本杂志回来看。

当时社会上青年男女还不能公开交往，我们只保持这样的接触。他还要求同我通信，我告诉他我家是封建旧家庭，不允许同男孩子来往。他说可以用女人的名字写信，于是就用“娥君”的名字每周给我来一两封信。还时常约我去公园，来去都各走各的路，躲躲藏藏地到没人的地方才谈话。经过交谈，彼此才有了日渐深入的了解。

这样来往了大半年，他忽然不辟而别，接到来信后才知道他回到台湾在《台湾民报》社工作。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是在我同魏姐姐常去泉郡会馆的时候，会馆里一个福建人通过他的朋友，对我一个叔叔说了张我军许多坏话，还自称是大富商的弟弟，要求同我结婚等等。我那个叔父同这个人见面后，听信了他的谗言，认为此人富有，可以养活我们母女三人，就决定包办这桩婚事。还说一个女孩子竟敢独自在会馆和男人来往，要赶快给她订婚，免得生事出丑。于是这位叔父并未向我了解事实和征询我对婚事的意见，使我根本无从分辩。

正当愁云密布之时，有人把这些消息电告我

军；他立即从台湾赶回北京，约我会面。他说事已至此，只有一起去台湾避难，否则前途将遭危难。我想家里没有父亲为自己作主，也只有外避一途了。就在这种情形下，只穿一身学生服，没有携带任何物件，同我军一起坐火车到上海，再乘船到厦门鼓浪屿，住在他堂兄家，然后写信给母亲和三叔。他们接到信后，立即寄钱和衣服给我，并要我们尽快正式结婚。得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高兴。经过商量，遂一同乘船去台湾，住在《台湾民报》社，请林献堂老先生作证婚人，王敏川先生作介绍人，在台北江山楼摆了两桌酒席，举行了婚礼。

1986年8月写于美国纽约寓所

喜迎《乱都之恋》归来

张光正

去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张我军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许多发言人都提到父亲青年时代创作的、台湾出版的第一本白话文诗集——《乱都之恋》。可是人事沧桑六十载，这本小册子早已淹没多年了。近二三十年，虽有不少人谈论过它，可除了早年刊登在《台湾民报》上的一篇诗集的序以外，阅读过全集的人怕是凤毛麟角了。

关于这本薄薄的、浅红封皮的小册子，母亲和三个弟弟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有好几本一直与家里的藏书放在一起。随着全家从北京迁回台湾，在台湾又搬过三次家，父亲的藏书和遗物越来越少。据弟弟们回忆，那几本《乱都之恋》却一直都在。它们的失踪是在母亲和弟弟相继离开台湾后，同寄存在别处的两个箱子一块不知去向的。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两年前我在编辑《张我军选集》时，为了找到这本诗集，遍访过北京、上海的各大图书馆和

资料室，有人还到重庆、广州、厦门找过；而台湾和海外也早就有人在多方寻觅，结果一概踪迹杳然，我从此就不抱太大希望了。

今年初，有人送来《乱都之恋》组诗十五首里的前七首。这是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湾出版的《人人》杂志第二号里摘登的。这七首诗《台湾民报》未曾刊载过，因此也未收入父亲的文集和选集，自然是十分珍贵的。《人人》杂志预告将在第三号续登组诗的后八首，可惜这本杂志出了第二号后即行停刊，无法从这里再查找下去了。

最近，一本原版《乱都之恋》的全文复制本，传来北京，送到我手上，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喜出望外之余，我觉得万分的感谢和庆幸。首先是感谢持有诗集孤本的收藏者和一些热心者，是他们使父亲这本文学遗产得以保存下来并能重现于世，其次是庆幸这一珍贵的诗集，在它出版六十周年到来的时候，有了重印发行的可能。让它同渴望看到它的读者见面，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现在总算有条件实现了。

诗集的原版本宽九点五公分，长十七公分，正文共五十六页。素雅的浅红封面上印有 抒情诗集 乱都之恋 张我军作 一九二六年 字

样。书内注明：发行于日本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地址是台北太平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集里汇编了父亲在一九二四年三月至十二月创作的五十五首新诗，其中有三十一首没有在《台湾民报》上刊载过。

这些诗是父亲于一九二四年，在北京、返回台湾途中、故乡板桥三个地方写的。主要以那时军阀混战、人心惶惶的北京城为背景，抒发了热恋、相思、惜别和怀念等种种情思，表现出对人生的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憎恨和对光明的憧憬。这些新诗的写作，也正是父亲在《台湾民报》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台湾旧文坛，积极传播祖国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的时候。他的诗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他的革新思想，同他的评论文章是相得益彰的。

愿这本归来的诗集能早日同当代读者见面！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日

（原载《台声》杂志一九八六年第九期）

附录〔三〕

张我军先生传略

本社资料室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一九〇二年生于台湾省台北县板桥镇。台湾省著名文学家。笔名一郎、迷生、忆、MS、野马、以斋、剑华、老童生、大胜、四光等。

幼年家境清贫，小学毕业后即当学徒、勤杂工。业余致力学习汉文及中学课程，后经老师介绍入新高银行工作。一九二一年，他十九岁，被银行派到厦门鼓浪屿的支行服务。当时正是“五四”运动深入发展之际，他深受鼓舞：“自从领略了海的感化和暗示之后，我就不想回到如在葫芦底的故乡了。”（张我军：《南游印象记》）张我军这名字也于此时启用。一九二二年，厦门新高支行关闭。他用遣散费只身北上故都求学。一九二三年就读于北平高等师范学校附设的升学补习班。

在北京求学期间深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一九二四年开始创作新诗，三月完成新诗《沉寂》。

后与同班同学罗心乡女士相恋。四月投书《台湾民报》，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呼吁“协力改造社会”。九月著文《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寄望人们能“脱却旧文学的迷梦，踏入新文学的路上”。此文未及发表，张我军便于十月上旬返台，入《台湾民报》任汉文栏编辑，十一月在《台湾民报》发表此文。此后近一年之内他连续撰写并发表《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文学革命运动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论文，以一个“文学道上”“清道夫”的姿态，全力抨击台湾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沉重地打击了台湾旧思想、旧文化、旧文学。以他为新文学主帅而展开的新旧文学的论争，是以新文学的胜利，旧文学的失败而告终的。

与此同时，他通过《台湾民报》大力介绍和宣传中国大陆新文学的作家作品，举凡鲁迅及其《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郭沫若及其《牧羊哀话》、《江湾即景》，冰心及其《超人》等均得以与台湾读者见面，他还专门著文详细介绍了胡适的“八不主义”与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等新文学理论，扩大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在台湾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出版诗集《乱都之恋》。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一九二六年正式发行。一九二六年起，他又发表小说《买彩票》、《迷惑》、《白太太的哀史》等。此外，他还写有《随感录》等散文以及研究日文的专著和翻译作品。

一九二五年，张我军再度赴北京，考入中国大学文学系，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一日，张我军曾前往尊师鲁迅先生寓所登门求教，得到鲁迅先生的勉励。鲁迅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有“张我权（按：系张我军之笔误）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的记载。这四本《台湾民报》现仍珍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一九二七年四月，鲁迅先生在广州写的《写在劳动问题之前》一文（《而已集》）中，曾经追记同张我军此次谈话的内容，赞美台湾青年关怀国事的精神。一九二九年于北师大毕业后即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等院校任日文讲师。抗战期间，曾任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台湾，先在台湾茶叶公会任秘书，后任职于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室。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日因患肝癌于台北逝世。一九七五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我军文集》。

一九八五年，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了《张我军选集》

一九八六年，散失六十年的《乱都之恋》回归北京。本社重版印行。

张我军先生一生追求光明，憎恶落后，是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和开拓人。

乡国之情 血泪之华

——写在《乱都之恋》重版前夕

张仲景

海峡两岸喜爱台湾新文学的人，大都怀有一个不可排解的遗憾：台湾新文学历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张我军的《乱都之恋》，早已绝版，再领略不到她的全貌了。可是，谁能想到，在她刊行六十年后的今天，这本写于北京、台北两地，出版于台北的抒情诗集，酷似一位浪迹天涯又渺无音讯的游子，历经坎坷，终于安然地回到了家乡——北京！十年前，张我军先生的次子张光直在台湾编定《张我军文集》，并交由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十年后的今天，这一部“归来”的诗集，则由其长子张光正在北京编校，由辽宁大学出版社重版发行。这一“巧合”，不知是亲人阻隔的悲剧，还是手足同心的美谈？

笔者有幸在张光正先生处拜读了这本诗集的

复印稿。捧着它，诵读，思索，诗集的份量逐渐加重了，似乎双手捧着的不是一本薄薄的诗集，而是风起云涌、大浪涛涛的一个动荡的世纪。这是开放在那个时代里的一束血泪凝聚的鲜花，她所具有的鲜明个性和时代特征，由于植根于海峡两地的沃土之中而变得更加熠熠夺目。

—

诗集除去《序》和附文《弱者的悲鸣》以外，包括十一篇五十五首抒情诗。其中三十三首写于北京，十五首写于海上途次，七首写于台北。写作的时间是在一九二四年三月至一九二五年春。这是张我军先生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三月，客居北京、受到五四新文学直接陶冶的张我军，开始了新诗创作。收在本诗集里的《沉寂》是台湾文坛最早见报的新诗，有趣的是她成了张我军与同班同学罗心乡女士相识相爱的媒介。

这一年四月，他投书《台湾民报》，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期望青年一代投入“改造社会的运动”。十月，他返回台北，以文学“清道夫”的姿态，赶写了一系列论文，打响了向台湾旧文坛进攻的第一枪。

但这位文学疆场上的勇士，与罗心乡女士的

爱情却面临着长辈的作梗和威胁。他从台北又匆匆赶去北京，与罗女士一同冲破封建牢笼，走避厦门，终于赢得了爱情的幸福。

这一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张我军经历的是多么丰富的人生；这自然是《乱都之恋》能够诞生的关键。

于是我们注意到：《乱都之恋》中的五十五首抒情诗，虽可相对独立，但却是不可割裂的整体。她描述了一位台湾青年和一位北京姑娘相爱历程中的悲欢离合。诗中抒情主人公基本就是作者自己。这部诗集既是受“五四”大潮洗礼的青年，挣脱封建锁链的爱情诗，也是离家万里寻求理想的诗人张我军自己多层心态的真实写照。

《序》诗对苦闷时代的诅咒，对真挚爱情的自觉追求，正是这部诗集中全部诗作的诗魂，它所表达的正是经历了“五四”这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觉醒了的青年一代追求光明、反抗黑暗的共同心声。它们融和在一起，谱成一曲甜美又焦虑、绚丽又灰黯的爱情之歌。

《沉寂》这第一首，透过“大好的春光”与“十丈风尘的京华”的鲜明对比，抒发出一位台湾青年对美好青春的赞颂，和对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的文化名城北京的仰慕、惋惜、不满等矛盾心绪。深深的乡愁，苦苦的相思，又置于这样一个

风烟滚滚的异乡，一个年青的心灵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负担！

背井离乡的游子，一无所有，然而他得到了爱情。在金钱、权势主宰着一切的旧世界，姑娘不贪钱财，不求权势，把珍贵无价的爱情献给了这位客居北京的穷学生。这深挚真诚的爱情，在一颗追求理想累遭挫伤的心灵里，该是何等的光华！难怪诗人在《对月狂歌》里，把他心目中的爱人比做“月里的美人”，表达了无比的倾慕和尊敬。那一声“我赞美你”，温暖了他被“沉寂寂的夜”冷却了的生命。

在《游中央公园杂诗》里，诗人真切地描述和抒发了自由恋爱的欢愉。请读第五首：那心灵交融的悄悄细语，一往情深的微笑笑容，大自然的一切沉浸在爱的幸福世界里。纯净如月的爱情，在当时有无数青年在追求，然而却只能是梦中出现的意境，而在诗人的笔下成了现实。诗人将爱情的甜美毫无隐讳地直抒出来，予以热情歌颂，这对当时深受封建婚姻之害，或正在憧憬自主婚姻幸福的读者，该是莫大的鼓舞吧！

但是诗集里更多表现的是爱情的忧虑，这是那个特定的时代和主人公的特殊身份决定的。那时真挚相爱的恋人，不能公开相爱，只能偷偷幽会，“来去都各走各的路，躲躲藏藏地到没人的

地方才能谈话”。（罗心乡：《忆乱都之恋》）

《无情的雨》这一章生动地描述了主人公与恋人幽会中激奋又担忧的心理。自然界中的无情的雨对恋人的刁难，也可看作现实生活对爱的种种阻拦。当时青年男女相互慕悦的美好爱情，却要处处受到鄙视，这不能不令恋人感到心灵被桎梏的痛苦。尤其在这位丁岛青年身上，被压抑的苦闷就显得格外沉重。

《秋风又起了》这一篇，乍一看来，与诗人的爱情生活无关，似乎仅只抒写游子对家乡慈母的深深挂念，对亡父墓碑的悲凉追忆，但在“何处是前程”的沉重感叹里，凝聚着的一股不可排遣的郁闷，是由柔情、乡情、昔日愿望的幻灭和爱情前途的渺茫——“心儿也痛”揉合而成的。因而我们才在紧接下来的《前途》一诗里，听到了丁岛青年那痛心疾首的感叹，看到了一副向往美好前程的青年忧心如焚的焦虑心态：

唉，茫茫的宇宙，
短促的人生，
青春将去了，
前途！前途！
可怕的，可咀咒的前途！

这种时代的失落感，来自他对时光即逝、青春短暂应万分珍惜的深刻认识，来自他对理想前途

的热切追求。一切魑魅魍魉都巴望黑夜无止境地延长,只有热烈追求光明的人才把黑暗诅咒。出现在诗集里的一切“寂寞”、“无聊”、“兴叹”、“烦闷”、“忧伤”、“凄酸”,都是渴望光明、遭到挫折的曲线反映,都是对“乱都”黑暗现实的愤懑和抗议。

在文学阵地上,张我军先生是冲锋陷阵的猛将;在爱情的天地里,他是一个奋勇前行的勇士。在《我愿》里,他用贴切的比喻,表述了刻骨铭心的相思;在《危难的前途》里,他描写了封建礼教对于圣洁爱情的伤害;《乱都之恋》十五首,浓涂重抹地描画了与恋人不得不暂时分离的伤痛;《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则毫无顾忌地肯定了爱情在生命中的地位……。充满在这部诗集里的挑战性的爱情告白,在六十多年前的台湾文学史里绝无仅有。一般伪道学者将爱情的健康欲求视为卑俗,甚至比作洪水猛兽,向来不容许把男女正常的情爱,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张我军先生真诚勇敢地公布并赞颂青年人的情爱,缠绵不俗,悱恻不浊,不是使人颓废,而是令人惊醒,这对旧道德和旧文学都是一种极大的蔑视和有利的反叛。

张我军先生在《诗体的解放》里强调,新诗要有“高洁的思想”、“优美的感情”、“醇直

的表现”和“内面的韵律”。他把这四要素归结为“一个诗的公式”：“高潮的感情+醇直的表现=紧迫的节奏=诗。”他说：“诗是以感情为性命的，感情差不多就是诗的全部。”《乱都之恋》正是这样的诗，她的感情源于张我军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人生，热爱亲人；源于对日本殖民统治和封建势力的憎恨；源于他与罗女士相爱历程中的欢乐与痛苦的切身感受。张我军在追求爱情、理想的山路上攀缘，跋涉在台北、北京之间。尽管“五四”浪潮在猛冲狂击，盘根错节的黑暗势力仍旧在处处扼杀新生力量。张我军经历着“五四”时期众多仁人志士同样的追求、失望、激奋、担忧，时代的恶和喜，幻灭和希望熔铸着他诗集里的句句行行。在那个“青年男女还不能公开交往”的年代，张我军先生与罗心乡女士真诚又艰难地苦苦相爱。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然与时代的痛苦与欢乐相融合，炽烈真挚的爱情光华在民族灾难深重、封建礼教还宛若樊篱的时代映照下，自然地涂抹着被压抑的暗影。但是当张我军因了故乡的召唤对心爱的姑娘“不辞而别”，当他冲向群魔乱舞的台湾旧文坛，为新文学的诞生而大喊大叫，当他即将迎来爱情与事业的大胜利的时刻，谁又能说那苦难中的爱情，没有给他们以生命的喜悦和前行的勇气

呢？张我军先生写于决战时刻的《春意》，表达了诗人久久期盼的春日已经到来时的那种震颤心灵的欢欣与兴奋。《弱者的悲鸣》里，诗人要“黄莺儿”冲破“隆冬的威严”、“吐尽”“积愤”，要“白云”战胜“恶热的毒气”，“飞向”“前程”，高呼：“唱呀，唱破你们的声带……飞吧，尽量飞向你们的前程！”这是“春蚕至死丝方尽”的宣告，是生命一息尚存，斗志不可泯灭的奉献。标题冠之以“弱者”“悲鸣”，对照着诗句里的“隆冬的威严”与“恶热的毒气”，更为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压制一切美好事物成长的恶势力的反抗，对光明的向往与执着的追求。

《乱都之恋》确是诗人血泪凝成的爱情之花。作者通过对爱情生活的多侧面的真切描写，使之具有丰满的个性、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

张我军先生在阐述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打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好的内容如美人，技巧如脂粉，如美丽的衣裳。”美人“若加以适当的脂粉和美丽的衣裳，则愈显得其美。”

（《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诗集里不少诗

篇正达到了这种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艺术境界。请读《烦闷》，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情景交融的图画！黄昏的光照，落日的余晖，老树的枝桠，透过诗人对现实失望的眼神，和着因爱亢奋又焦灼的狂烈心跳，一个多么丰满的忧伤的立体形象；所有的光彩、物体的轮廓和声响都揉合在“烦闷”这种诗绪中。诗人擅长把恋情融合于自然，“月亮”、“雨滴”、“黑云”、“小草”、“虫蛙”、“秋柳”、“小河”……在诗人的笔下，在恋人的心绪里，巧妙地人化，情化，含蓄又鲜明地表现了恋人丰满的爱情心态，达到令人心恸的艺术效果。

“五四”这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预示了社会的巨变。在新旧道德和文学双重碰撞的二十世纪，张我军先生以他的敏锐，捉住了青年人心境中碰撞最为激烈的爱情课题。他用朴素、通俗的语体文字，醒目的新诗形式，白描出爱情生活中的种种感受，对当时久已浸沉于旧诗词、击钵吟的台湾诗界，以及青年男女爱情仍然受着封建伦理道德摧残的社会来说，确实如春雷一般不同凡响。他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用过去没有人用过的手法，表现了过去从没有人如此表现过的爱情，为诗歌创作开拓了新天地，开创了台湾新文学史上新诗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

《乱都之恋》这束曾开放在败草丛中的鲜花，在苍凉的晨风里散发着纯净的芳香，传递着春天的气息，就是在今天中国现代文学万紫千红的百花园里，她仍然以她独特的姿态占有重要位置。不要挑剔她还有些单调，不能指嫌她还不够精巧，她恰似黎明前天边的一抹曙光，尽管有些微薄，却宣告着黑夜即将过去，光明必定来临。

1986年12月于沈阳

台湾新文学的鼓吹者

——张我军及其诗集《乱都之恋》

〔台湾〕黄天横

张我军，本名张清荣，别号一郎，台湾省板桥人，一九〇二年（日据明治三十五年）生于板桥，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日逝世于台北，享年五十四。他早年留学北京，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把新文学的理论与讯息介绍给台湾同胞，可谓当时新旧文学论争中，代表新文学的活跃人物，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鼓吹者。一九二〇年代后期，张我军赴大陆，担任北京大学及辅仁大学的日语教师，在此期间中写稿与日据时代台湾人唯一的喉舌《台湾民报》，鼓吹新文学，提倡废弃旧思想。当时的台湾正受世界性的新思潮冲激，开始由武力抗日转变为以政治运动反抗日本的强压政治，由留日台籍学生组织“新民会”在东京发行了《台湾青年》、《台湾》发展到《台

湾民报》，以至“文化协会”的结成等，都证明了知识分子的自觉相当热烈。

张我军即在此时期寄稿与《台湾民报》，表现出他对于台湾文学及台湾的关心。据统计，计发表了新诗《无情的雨》十首（二卷十三号）、《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二卷七号）、《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二卷二十四号）、《欢送辜鸿铭博士》（二卷二十号）、《为台湾文学界一哭》（二卷二十六号）、《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三卷一号）、《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三卷二号）、《揭破闷葫芦》（三卷三号）、《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法》（三卷四号）、《随感录》（三卷六、十、十二、十八号）、《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三卷六、七、九号）、《复郑军我书》（三卷六号）、《诗体的解放》（三卷七、八、九号）、《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三卷七号）、《生命在什么事做不成》（三卷十号）、《央庵〈一个贞烈的女孩子〉批评》（三卷十八号）、《介绍郭沫若新诗〈仰望〉等》（三卷十八号）、《宗教革命家甘地》（五十九、七十三号）、《贞操是〈全灵的〉之爱》（六十号）、《新诗〈春意〉、〈弱者的悲鸣〉》（六十一）、《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六十七）、《至上最高道德——恋爱》（七十

五）、《中国国语文作法》（七十六）、《文艺上的诸主义》（七十七、八十三）、《诗集——乱都之恋的序文》（八十五）、《危哉台湾的前途》（八十六）、《南游印象记》（九十六——九十六）、《爱欲及引言》（九十四、九十五）、《弱小民族的悲哀》（一〇五——一一五）、《诱惑》（二五五——二五八）。

这些文章都是以白话文写作，鼓吹新文学、提倡新思想的文字。其中，诗集《乱都之恋》的序文，特别令人注目。主要原因这不仅是张我军的第一本诗集，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上的第一本新诗集，但因岁月淹久，如今得见这本诗集的人可谓甚稀，于是成为研究者，需寻找的文学文献。

去年七月某日，本地作家旧知龙瑛宗带目前在日本立教大学执教的戴国辉来敝舍访问，闲谈间就问及笔者有无张我军这本发行于一九二六年的《乱都之恋》。戴国辉是去年三月卅一日在台北市议会地下楼举行《杨逵追悼会》时的初识，他因在东京研究台湾近现代史而急需此一甲子前的资料，在日本找不到，趁回台机会问询各地图书馆及藏书较多者，无人持有此一诗集。最后龙瑛宗带他来找我，我也没有，只告诉他尽力搜求而已。戴教授返日后笔者探问古亭书屋高贤治，

他即时回答笔者有藏，但他近来经数次的搬家一时找不到。又经过半年，上月底才找出该书，而且赠送笔者了。笔者在此表示感谢张君平素热心蒐集台湾文献而慷慨赠书之好意。

该书宽九·五公分、长十七公分，连封面封底只有六十四页，发行于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地址为台北市太平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序文以新诗形式写的，曾刊于《台湾民报》八十五号，该诗刊登时並有说明：“《乱都之恋》一册系张我军君的第一诗集，张君这一年来的作诗尽收在这里，有的发表于北京晨报，有的在民报发表，也有未曾发表的。这次受了朋友之劝，已决定印成书在新历年底可发行。”等语。

全书诗作计有十二题，其中有一题四首、六首、十首不等，《乱都之恋》是十五首组成的。

该诗集的存在，凡关心新诗的人想必都知道。和杨云萍曾于《台湾新文学的回顾运动》

（如篇文原为李献玛主编《台湾小说集》写的序文的一部分，但《台湾小说集》排版甫成即遭日本政府禁止，未得成书）、又在《人人杂志创刊前后》（刊于《台北文物》第二卷第二期）两文中都提起过，最近李魁贤写《台湾新诗的渊源流变》（《台湾文化》第五期）也介绍过。

至于内文新诗，除了《台湾民报》的二、三

首，及几年前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四《诗选集》一册里介绍二首。笔者不敢说该书是现存孤本，但可谓是一本台湾新文学研究者的贵重文献，而且是属奇觐书之一也。

（原载台湾《自立晚报》

1986年5月4日）

